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张照贵

2000年中国已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在此阶段人们的生理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但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的小康水平是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前提下实现的。没有“先富起来”的前提,不可能实现小康社会,这时主要解决的是效率问题。但当一个社会总体达到小康水平时,公平(或者说是人们的安全需求)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而效率与公平从来就是困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一大难题。若不正视该问题或解决措施不当,则可能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 一、七城市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

### (一)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

“生活质量”的概念最先是由美国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1958年提出的。所谓生活质量,就是用来反映居民生活需要满足程度的一个概念。许多研究机构在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时,已用“生活质量”代替传统的“生活水平”一词。“生活水平”是指社会提供给广大居民用于生活消费的商品数量和质量的状况,

主要反映居民在物质需求方面的满足程度。“生活质量”则是全面、综合地反映居民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既应包括物质生活的需要,也还包括精神生活的需要。从“生活水平”到“生活质量”的转变,不仅仅是一个概念的变化,而是一种从“物”到“人”的社会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深刻变化。

在1943年,美国的亚伯拉罕·马斯洛(A·Maslow)在《人类动机理论》一书中提出“需求等级”学说,他把人的基本需求按发生顺序由低到高具体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心理、自我完成等5个方面的需求。本指标体系拟依据马斯洛的“需求等级说”为理论基础来设置。为此,我们将该指标体系分成生理需求、安全与社交需求、全面发展需求三大板块。由于生活质量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宏观经济条件,所以再加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一板块构成衡量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框架。

### (二)七城市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1971年把

人类社会发展分为6个阶段:①传统社会阶段、②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③起飞阶段、④成熟阶段、⑤高额消费阶段、⑥对生活质量的追求阶段。他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处于传统社会阶段,一些工业国家进入起飞阶段,大部份发达国家则进入高额消费阶段,进而转入对生活质量要求阶段。罗斯托认为,在6个发展阶段中,起飞阶段和追求质量阶段是两个关键性阶段。起飞阶段就是要突破经济停滞的传统阶段,使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发生剧烈转变,从而进入持续发展阶段。人类社会的另一重大突破是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进入这一阶段的主要标志是“质量部门”作为主导部门。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时,人们不再以有形产品数量的多少来衡量社会成就,而是以服务形式反映生活质量的状况来衡量社会成就,他称之为这是人类社会“一个真正的突破”。我们认为,起飞阶段若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按照世界银行对国家的分类,应相当于中下等收入到接近中上等收入

## 一步保证

由于初级单元是家庭,因此当家庭成员多于一人时,就需要对被访家庭成员进行随机抽样,选取其中一人进行访问。比如,选取最近生日的那个成员进行访问,或者叫接电话者按照年龄和性别将所有家人排序,然后访问员从中随机选一人。这些措施虽小,但是其随机性也是民意测验反映真实民意的保证之一。类似的方法也可我国的民意测验所借鉴。如果选中的被访对象不在家,则实行再访问程序(Call-back Procedure),即在调查期间随后的晚上打回电,尽量找到选定的人,以减少误差。实际存在的问题是,不在家的成员比较可能是年轻的成年人,或者由于喜欢讲电话的人占住电话使电话无法拨通。不管是年轻人或是喜欢讲电话的人,这些群体都很可能有相同的特征,如果忽略这些人而另找被访对象,出现误差在所难免。

## (四)测验结果的调整

由于抽取的样本有可能没有精确地反映总体的真实结构,民意测验的结果将根据人口统计的变量,如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或者国家地区进行加权调整,保证民意测验的结果对总体具有代表性。这个步骤也不能少,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文化层次差别很大的国家。

综上所述,盖洛普公司繁琐的调查程序大多是为了实现随机性。随机性是民意测验能真正反映民意的基础。而且,笔者发现,对某些原始样本单元的遗漏或更改,可能会导致很大的误差。因为遗漏或更改掉的样本单元常常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特征,遗失这些样本单元,意味着民意测验并没有整体地反映民意。因此,要广泛的反映民意,实现随机抽样原则,就要重视抽样框的完整性,力求所有原始抽取的样本单元入样。

## 三、民意测验在我国实施的建议与

## 局限性

由于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尚不能如美国般进行民意测验。首先,由于我国政治透明度的局限性,干部选拔不宜滥用民意测验,笔者认为民意测验的结果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关键因素。其次,民意测验尚不适宜大面积应用。这是因为中国人普遍具有从众心理,民主意识不够浓厚。第三,可考虑在大中城市率先运用。一是城市居民文化程度普遍较高,二是目前我国大中城市已有一定民意测验的经验,三是因为我国农村封建意识还比较牢固,文盲的现象还比较严重。民意测验的代表性可能受到质疑。最后,笔者认为还得提防由于民意测验带来的民主思潮的泛滥,有关方面需建立一定的应对防范措施。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易永生)

的低限为起飞阶段。世界银行在《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对211个国家及地区进行分组,199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760美元及以下的低收入国家有63个(中国也列在该组,1999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750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761-936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有94个。其中761-3030美元的中下等收入国家有58个,3031-9360美元的中上等收入国家有36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9361美元及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有54个。按照世界银行的这种分类标准,我国在2000年人均GDP为856美元,已进入中下等收入的国家。

按照世界银行的这种划分标准及资料可得性,我们得到广州、北京、上海、成都、西安、昆明、重庆七个城市有关生活质量的资料如下(见表1)。

表1 2001年七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资料

指标	单位	标准值	权数(%)	广州	上海	北京	成都	重庆	昆明
人均GDP	(元)	15000	10	38007	37382	25523	14676	5650	13900
第三产业比重	(%)	50	4	54.49	50.7	58.9	45.8	41.7	45.52
城市人口比重	(%)	45	3	53	95.1	57.0	34.8	22.3	40.0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人年均)	10000	8	14694	12883	11578	8128	6721	6927
恩格尔系数	(%)	40	4	40.0	43.1	36.2	37.4	38.7	41.4
人均居住面积	(平方米/人)	14	3	13.87	12.5	11.64	17.3	11.47	14.17
基尼系数		0.35	5	0.26	0.26	0.31	0.33	0.3	0.29
户均就业率	(%)	55	5	52	51	52	46.8	55.4	47
刑事案件立案数	(件/万人)	40	4	123	81	57	63	38	91
人均报纸拥有量	(份/人年均)	120	3	380	118	695	134	99	59
中高级职称人数	(人/万人)	250	3	42	31	50	18	14	22
千人拥有电话数	(部/千人)	400	2	1312	600	570	415	285	246
千人拥有电脑数	(台/千人)	80	2	195	125	150	83	57	70
公共绿地面积	(平方米/人)	8	2	11.18	5.56	10.1	2.78	1.41	7667
人均道路面积	(平方米/人)	8	2	6.5	10.1	6.8	6.51	3.3	6.58

注1:资料来源于成都市城市调查队 注2:数据下有横线的为推算数据

用综合指数的方法得到七城市的总分及排名(见表2)。

根据表2的资料,广州、上海、北京三个城市的综合指数超过80,按照设定的标准,这三个城市已进入成熟阶段,即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城市水平。而在中、西部4个城市中,成都、昆明和西安已接近达到起飞阶段,重庆则接近达到小康阶段。

当然,按照不同的综合评价的方法、不同的权数及标准,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这里得出的结果仅具有参考和研究价值。但可以看出中国在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在区域上的不平衡及差距。

## 二、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反映安全需求方面的生活质量均有所下降

在资料的收集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三个反映安全需求方面的生活质量均有

所下降,如基尼系数,成都市由1995年的0.23上升到2001年的0.33,上海市由1995年的0.22上升到2001年的0.26,广州市由2000年的0.25上升到2001年的0.26;刑事案件立案数由1995年到2001年,上海市由24000件上升到107400件,广州由59775件上升到123554件,成都市由14994件上升到63612件,西安市由11956件上升到33594件;而户均就业率由1995年到2001年,成都市由57.9%下降到46.8%,重庆市由62.2%下降到55.4%,西安市由55.9%下降到45.6%。因此,在前面的居民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中,我们加大了对安全需求的考察力度。

(二)就业率的下降是造成国内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七城市有统计户均就业率的资料

来看,这一指标近几年均呈下降趋势。成都市的户均就业率由1995年的57.9%下降到2001年的46.80%,西安市由1995年的55.9%下降到2001年的45.65%,重庆市由1995年的66.2%下降到2001年的55.4%。而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有大幅度增加,成都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5年的5047元上升到2001年的8128元,增幅达61.05%,重庆市由1995年的4413元上升到2001年的6721元,增幅为52.3%,西安市由1995年的3914元上升到2001年的6705元,增幅更是达71.31%。然而,由于失业率的上升、预期消费的增加导致收入增加的大部份流入银行,使储蓄倾向增强,而消费倾向减弱。因此我们认为,居民对工作稳定安全预期的减弱不能不说是造成国内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中国的

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将长期存在,但从用工制度上的改变来看,我们认为,增强劳动者工作稳定性预期是增加国内需求的有效方法。日本的经验似有可借鉴之处,过去我们一直迷惑不解的是,资源缺乏且人口密度大于中国的日本为什么采用终身雇佣制的用工制度。过去将日本的用工制度与美国用工制度的不同进行比较时,主要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解释的。现在看来,日本的这种用工制度是否是在一定时期有为增强劳动者对工作稳定的安全性预期,进而达到增加国内需求的目的呢?这是值得研究的。

(三)基尼系数的上升是否会引起刑事案件案件的上升?

以七城市有基尼系数统计的资料来看,近年该指标均呈上升趋势。成都市由1990年的0.17上升到2001年的0.33,上海市由1990年的0.15上升到2001年0.26,广州市由2000年的0.25上升到2001年的0.26。而1999/2000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中公布的199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15。这已超过了公认的警戒水平。虽然二者的差距有可能是由于计算方法不同造成的,但基尼系数上升的趋势却不容忽视。因为基尼系数是从收入分配角度来显示社会公平的指标,收入的两极分化趋势已经成为我们面对未来发展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在绝对平均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达到小康水平几乎是梦想,那么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前面已经提到首先要解决的是效率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适应了这个阶段经济的发展。但当全社会总体达到小康水平时,若不对公平加以注意,由于“马太效应”的作用,则可能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以至产生许多社会问题,进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性。近年来各地刑事案件立案数的上升是否与基尼系数的上升使部份对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的认知度超过其可接受的程度有关,是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通过资料对比,我们发现广州、北京刑事案件立案数分别由2000年的141930件、82849件下降到2001年123545件、77896件,其中的原因除了主要加大对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外,是否与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注意到对收入分配公平性进行调节有关呢?因为这两个城市的基尼系数近几年均低于成都的基尼系数。

## 抽样

■王天营

## 根本不完整的一押处理方法

在抽样调查活动中,常常会出现样本数据不完整,一是调查者无法获得作为样本单元的被调查者的全部资料;二是调查者仅能获得问卷中某些项目的资料。前一种情况通常是因样本单元不响应而导致:(1)被调查者拒绝接受调查;(2)被调查者不在调查现场;(3)被调查者生病等生理原因无法接受调查;(4)调查人员无意或有意丢失调查问卷。后一种情况通常是因样本项目不响应而导致:(1)调查者不愿意回答的项目可能涉及到被调查者的个人隐私或是比较敏感的问题;(2)被调查者不予回答的问题所涉及的时间较为久远,被调查者无法给

出正确的答案;(3)问卷的问题模糊不清而无法回答;(4)被调查者有意或无意给出不真实的答案。可见,样本数据的缺失成因是多种多样的,其后果是样本数据的不完整,导致利用样本数据进行推断估计不能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

目前,在我国对抽样调查中出现的样本数据不完整(有时也称作样本数据缺失)问题的处理,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放弃不响应样本单元或不响应样本项目,只对响应样本进行加工处理,且由此得出关于总体的各种估计与推断。显然,这是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不响应样本与响应样本具有相同的结构和数量特

征。但是,事实上,愿意接受调查和不愿意接受调查存在着很大差别,不仅表现在调查项目的差异,而且表现在非调查项目的差异上。因此,采用放弃不响应样本,仅考虑响应样本,对总体的估计就会产生很大的偏差。对样本数据缺失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已引起抽样理论界和实际应用部门的重视,也有不同的学者提出各种各样的补救措施和方法。笔者在此也提出一种补救方法,以供参考。

## 一、构建样本经验分布函数

假定  $X_1, X_2, \dots, X_n$  为来自总体  $X$  的一个简单随机样本,其数学期望  $EX = \mu$ , 方差为  $DX = \delta^2$ 。  $X_1, X_2, \dots, X_{n-4}, X_{n-3}, X_{n-2}, \dots, X_n$

表2 2001年成都等七个城市的居民生活质量的综合得分及名次

指标	单位	标准值	权数(%)	广州市		上海市		北京市		成都市		重庆市		昆明市	
				单项分	加权分	单项分	加权分	单项分	加权分	单项分	加权分	单项分	加权分	单项分	加权分
人均GDP	(元)	15000	10	253.38	25.34	249.21	24.92	170.15	17.02	97.84	9.78	37.67	3.77	92.67	9.27
第三产业比重	(%)	50	4	108.98	4.36	101.4	4.06	104	4.16	91.8	3.67	83.4	3.34	91.04	3.64
城市人口比重	(%)	45	3	140	4.2	211.33	6.34	126.78	3.8	77.33	2.32	49.56	1.49	88.87	2.67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人年均)	10000	8	146.94	11.76	128.83	10.31	115.78	9.26	81.28	6.55	67.2	5.38	69.27	5.54
恩格尔系数	(%)	40	4	100	4	92.81	3.71	110.5	4.42	106.95	4.28	103.36	4.13	96.62	3.86
人均居住面积	(平方米/人)	14	3	99.07	2.97	89.29	2.68	83.14	2.49	123.57	3.71	81.93	2.46	101.21	3.04
基尼系数		0.35	5	132.58	6.63	134.62	6.73	112.9	5.65	106.06	5.33	116.67	5.83	120.69	6.03
户均就业率	(%)	55	5	94.55	4.73	92.73	4.64	94.55	4.73	85.1	4.26	100.73	5.04	85.45	4.27
刑事案件立案数	(件/万人)	40	4	23.12	0.93	49.38	1.98	70.18	2.81	64.52	2.58	105.26	4.21	43.96	1.76
人均报纸拥有量	(份/人年均)	120	3	315	9.45	98.33	2.95	579.17	17.38	111.67	3.35	82.5	2.48	49.17	1.48
中高级职称人数	(人/万人)	250	3	240.4	7.21	120	3.6	200	6	72	2.16	56	1.68	182.4	5.47
千人拥有电话数	(部/千人)	400	2	200	4	150	3	142.5	2.85	103.75	2.08	71.25	1.43	61.5	1.23
千人拥有电脑数	(台/千人)	80	2	250	5	162.5	3.25	187.5	3.75	103.75	2.08	71.25	1.43	87.5	1.75
公共绿地面积	(平方米/人)	8	2	139.75	2.8	69.5	1.39	126.25	2.53	34.75	0.7	20.25	0.41	85.88	1.92
人均道路面积	(平方米/人)	8	2	81.25	1.63	126.25	2.53	85	1.7	81.38	1.63	45	0.9	82.25	1.65
						95.01		82.09		88.55		54.48		43.98	
						1		3		2		4		7	
															5

(四)生活水平与恩格尔系数并未成反向趋势。

资料显示,广州、上海的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高于中、西部的成都、西安、昆明和重庆。但广州、上海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40.0%和43.1%,明显高于成都(37.4%)、重庆(38.7%)和西安(34.8%),这和国际上公认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导致恩格尔系数下降的发展规律相矛盾,这无疑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在计划经济时期及改革初期,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一直较高,一方面是由于生活水平本身较低引起的,另一方面是由于

国家对职工的住房、医疗等方面的补贴所造成的。但自国家对住房、医疗等方面改革后,恩格尔系数已基本接近真实水平。那么这种现象是由于各城市之间对住房、医疗等方面的改革在时间上的不同步造成的?还是由于各城市饮食价格相差太大造成的?或是恩格尔系数并不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线性的下降,而是起伏不定的下降(即在一个收入阶段会下降,而在另一个收入阶段会上升)?或者说在某一个相对较低的收入阶段,为了增加对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支出,而降低了对吃的方面的支出而

造成的?经过深入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中西部地区长期的经济滞后导致食品价格及消费水平偏低;加之住房、医疗、教育等改革的不同步及与发达地区收入的差距造成了对未来预见性支出的增加,引起了即期消费水平无法提高而造成的。

综上所述,中国总体的小康水平是在不平衡的状态下实现的,重视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措施解决,无疑对正确选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策是有帮助的。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责任编辑/亦民)